

# 孟德斯鸠的经济学思想及现代阐释

李增刚

**摘要：**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虽然主要以法学和政治学的思想贡献而被关注，但是其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其经济学思想是为论述其法学和政治学问题而阐述的，涉及经济学的多个方面，如宏观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等，很多思想对理解当前的经济问题仍有重要启发。研究孟德斯鸠的经济学思想并根据现代经济学进行阐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法国经济学在18世纪上半叶的发展，充实和完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关键词：**孟德斯鸠 政治经济学 经济思想

## 一、引言

之所以研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的经济学思想，有五个方面的动机。第一，从思想史的角度挖掘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已有的法经济学理论渊源通常追溯到意大利的切萨雷·贝卡里亚（Cesare B. Beccaria）于1764年发表的《论犯罪与刑罚》和英国的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于1789年发表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萨维尔，2009：4；沙维尔，2013：4；Polinsky and Shavell, 2007：xi）。但是，在他们之前，孟德斯鸠出版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以后第一本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sup>①</sup>即《论法的精神》。那么，孟德斯鸠是否阐述过经济问题？他在阐述政治或法律思想的时候，是否有经济学视角的分析或讨论？这是否构成比贝卡里亚和边沁更早的法经济学

---

[作者简介] 李增刚，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邮政编码：250100，电子信箱：casslzg@126.com。

<sup>①</sup> 转引自徐昕为钟书峰翻译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译本（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所写的序言《中国需要孟德斯鸠》。

的思想渊源？第二，孟德斯鸠时代社会科学并没有明确的学科界限，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并没有分开，也没有人宣称自己的专业或所属学科。就像孟德斯鸠被认为是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一样，有影响力的是思想家的著作及其思想，即使作为经济学鼻祖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也并非一开始就从事经济学的研究，而首先是道德哲学家。那么，很自然地就会提出：孟德斯鸠是否有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述？他是如何论述的？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如何？第三，“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在其著作中大量引用了孟德斯鸠的论述，尤其是在魁奈所著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其中涉及中华帝国或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与欧洲国家的比较，魁奈和孟德斯鸠都采用了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既然如此，孟德斯鸠本人是如何论述各国家的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的？是否存在基于经济问题或视角的讨论？第四，孟德斯鸠之前、之后法国经济学<sup>①</sup>均有发展，比如早于孟德斯鸠的重商主义，晚于孟德斯鸠的重农学派，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如安托万·德·孟克列钦（Antoine de Montchrétien）、魁奈、安纳·罗贝尔·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等。那么，孟德斯鸠的思想是否继承了之前的经济思想？是否对之后的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产生了影响？第五，欧洲其他国家的思想发展与孟德斯鸠思想之间的关系如何。孟德斯鸠曾经在欧洲多个国家游历，这为其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素材和基础。比如，他游历时间最长的英国，曾经出现过像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John Locke）、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等比他早的思想家，那么孟德斯鸠是否受到这些思想家的影响？而孟德斯鸠的著作发表之后是否又对这些国家的思想发展产生影响？

已有的研究孟德斯鸠思想的文献，绝大多数关注其政治思想和法学思想，国内外文献都是如此。只有非常少的文献关注孟德斯鸠的经济思想，而且大多数是法国学者的研究。在中文文献中，没有检索到专门研究孟德斯鸠经济思想的文献，只有极少量的文献研究孟德斯鸠的商贸思想（古海，1988；冯明亮，2015）、商业精神思想（张弛，2021；张弛，2020；余艳红，2012）。但是，孟德斯鸠的经济思想并不局限于商贸、商业精神等方面。即使《论法的精神》第四编专门与经济相关的方面，也不只是商贸方面的思想，而是非常详细地讨论了货币、人口等问题；这部著作的其他部分还涉及到财政（公

① 对于孟德斯鸠前后法国经济学的发展，参见贝劳德和斯坦纳（2016：437—442）。

共财政)、税收等思想,甚至还初步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的萌芽思想。

本文通过文本解读挖掘孟德斯鸠的经济思想,并进行现代经济学的阐释。边际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相对比较系统地综述国内外学者对孟德斯鸠经济思想的研究和评价;二是从五个方面系统阐述孟德斯鸠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结合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进行阐释。

余文安排如下:首先,综述国内外文献中关于孟德斯鸠经济思想的研究,阐明对孟德斯鸠经济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存在分歧;其次,挖掘孟德斯鸠经济思想的核心表述,并进行现代阐释,从而提出对现代经济问题的启发性思考;最后是总结。

## 二、文献综述:孟德斯鸠是否为一位经济学家?

对孟德斯鸠思想的研究成果有很多,毕竟他作为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不仅在思想上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在现实中直接指导了美国等国家政治体制的形成。对孟德斯鸠思想研究的绝大多数成果都是围绕其政治思想和法律、立法、司法等思想展开的,但是也有一些专门研究孟德斯鸠经济思想的文献,或者在经济思想史或学说史的著作中提到孟德斯鸠的经济思想。本部分文献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对孟德斯鸠著作的引用和思想评价,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斯密、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等的著作中涉及孟德斯鸠的有关表述;二是专门研究孟德斯鸠经济思想的论文或著作中的评价。

### (一) 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看孟德斯鸠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马克思、斯密、熊彼特等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提到了孟德斯鸠。

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他们的一系列著作中多次提到孟德斯鸠。根据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检索,他们提到孟德斯鸠达30多处。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有四处引用或提到了孟德斯鸠的观点。<sup>①</sup>其中,有两处是在论述货币本质和货币数量论观点的时候,

<sup>①</sup> 分别见马克思和恩格斯(1972)第109页注释47、第143—144页注释80、第676页注释73、第824页注释243b。

马克思的引用并不是专门引用孟德斯鸠的观点，而是在批判地引用多个作者的观点中包含着孟德斯鸠的观点和著作；有一处是通过引证另一个学者的观点否定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的观点；还有一处是在论述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单独引用了孟德斯鸠的一个有点戏谑性的观点，来说明金融家利用政府特权等通过投机进行资本积累。在《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有三处提到孟德斯鸠及其《论法的精神》：有两处涉及到劳动的区分问题——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自由民的劳动和奴隶的劳动；有一处是讨论西蒙·尼古拉·亨利·兰盖（Simon Nicolas Henri Linguet）的《民法论》中的核心观点“法律的精神就是所有权”，以批评孟德斯鸠。从对马克思著作中提到“孟德斯鸠”之处的分析，可以看出：（1）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提到孟德斯鸠两个方面的思想，一是“立宪主义”的政治观点，二是货币数量论的观点；（2）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孟德斯鸠的“立宪主义”观点持批判或反对的态度；（3）马克思批判了孟德斯鸠关于货币本质和货币数量与物价关系的论述。但是，孟德斯鸠关于“货币”的论述并非其思想的核心，只是法律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论述“法律和使用货币的关系”时研究和阐述的。

经济学的“鼻祖”斯密作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所研究和讲授的内容“涵盖哲学、神学、法学、政治学和经济学”<sup>①</sup>等方面，从主题上看至少涵盖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斯密多次提到孟德斯鸠。在《法理学讲义》中，孟德斯鸠名下的索引页码有28个，多次涉及孟德斯鸠的观点。按照《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原编者引论”中的说法，“在这个学科上，他采用了好像是孟德斯鸠所建议的计划”（坎南，1962：6）。可见，斯密深受孟德斯鸠的影响，然而在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却未找到对孟德斯鸠的提及或引用。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中都提到了孟德斯鸠。在第一卷中，熊彼特将孟德斯鸠视为“历史社会学家”，给予其高度赞扬。他指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则是严肃的社会学，……它是根据许多客

① 见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为斯密的《法理学讲义》中译本写的《中译本序二》（斯密，2017：11）。林森木在为《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中译本写的简介《亚当·斯密早期的经济思想》中也指出，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教授的“道德哲学”是带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课程，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见坎南（1962：1—2）。

观因素来设想社会历史状态及其变化，由此而得出了符合实际的解释，并在这一意义上得出了分析理论，而不是只得出简单的，特别是唯理主义的一般公式。这确实是一新开端，在方法论上意味着与自然法观念发生了重大决裂。”（熊彼特，1991：209）在第二卷中，熊彼特在阐述“环境决定论”的时候澄清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环境决定论”的思想。他认为，“在我看来，孟德斯鸠似乎并未过高估计环境因素的解释价值。……《论法的精神》是那个世纪的最有名的和传诵最广的著作之一”（熊彼特，1992：86）。

在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工具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没有“孟德斯鸠”的专门辞条，但是在“法国经济学（1870年以前）”中专门提到了孟德斯鸠及其思想：“在德·古尔内的著作和他小团体成员的著作中，或者在孟德斯鸠（Montesquieu）《论法的精神》（*Spirit of Laws*）中，商业这门学科得到了明确阐述，他们概括出四个特点。第一，贸易是由国与国之间的商品流构成的，商人根据其实际知识来交易他们的剩余产品。第二，贸易依赖于利己主义行为，因此，这意味着，商人从经济上和象征意义上讲对保持其一生的特殊地位感兴趣，而对得到贵族身份不感兴趣。第三，贸易是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形式。第四，商人的特殊利益可能与国家的利益相对立。”（贝劳德、斯坦纳，2016：438）

在其他的经济学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的著作中，也很少提到孟德斯鸠。如哈里·兰德雷思（Harry Landreth）<sup>①</sup>和戴维·科兰德（David C. Colander）<sup>②</sup>的《经济思想史》（兰德雷斯、柯南德尔，2014）、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的《经济理论的回顾》（布劳格，2009）、小罗伯特·埃克隆德（Robert B. Ekelund, Jr.）<sup>③</sup>和罗伯特·赫伯特（Robert F. Hébert）的《经济理论和方法史》（埃克隆德、赫伯特，2017）等没有提到孟德斯鸠。也有的教科书虽然提到孟德斯鸠，但是并没有对孟德斯鸠的经济思想展开详细论述。比如，罗杰·巴克豪斯（Roger E. Backhouse）的《西方经济史》（巴克豪斯，2007）专门一章的标题是“18世纪法国的专制主义和启蒙运动”，在“启蒙运动”

① 亦有译为哈里·兰德雷斯。

② 亦有译为大卫·柯南德尔。

③ 亦有译为小罗伯特·埃克隆德。

一节中提到了孟德斯鸠——“研究法律准则的孟德斯鸠”（巴克豪斯，2007：103），而且是与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艾蒂安·博诺·德·孔狄亚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等启蒙思想家共同提到的，没有涉及孟德斯鸠任何经济思想的介绍。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C. Robbins）在《经济思想史：伦敦经济学院讲演录》介绍理查德·康替龙（Richard Cantillon）<sup>①</sup>和重农学派的时代背景时提到了孟德斯鸠：“还有一些次要的学者……他们的书，我想，不值得你们非常注意，除非你们要写关于他们的论文。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他的《法的精神》[1748]的一编中偶然评论了经济问题。”（罗宾斯，2008：113）在一部由意大利学者亚历山德罗·龙卡利亚（Alessandro Roncaglia）<sup>②</sup>所著的《西方经济思想史》中，作者在介绍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的思想时提到了孟德斯鸠：“杜尔哥遵循了孟德斯鸠的思想……后者认为一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与其生产组织之间存在着联系（或用更有力的话来说，即唯物主义观点：经济生活状况影响社会的其他所有方面）。由此杜尔哥提出了所谓的‘四阶段理论’。”（荣卡格利亚，2009：92）

从上面的这些著作可以看出，马克思、斯密、熊彼特等虽然关注到孟德斯鸠的思想，但是没有专门论述孟德斯鸠的经济思想，在其他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的教科书中，也是如此。

## （二）将孟德斯鸠作为经济学家研究其经济思想

在研究孟德斯鸠思想的文献中，虽然主要集中于其政治思想、法学思想等的研究，但是这一时期的学科背景决定了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甚至神学、伦理学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也没有专称的“经济学家”，而自称为或专称为“经济学家”的小团体是在孟德斯鸠之后的“重农学派”。孟德斯鸠在论述政治学、法学思想的时候也涉及到了经济学思想，因此有一些文献专门研究了孟德斯鸠的经济思想。

在这些文献中，比较早的一篇文献是1941年发表的题为“孟德斯鸠与不列颠思想”的论文（Crane，1941）。作者提到，“很可能是孟德斯鸠教导斯密要在特定的政治和历史环境下研究经济问题，特别是要把金融交易和制度与

① 书中译为坎蒂隆。

② 亦有译为阿列桑德洛·荣卡格利亚。

政府形式联系起来”。这就强调了斯密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受到了孟德斯鸠的指引和影响。

第二篇值得强调的文献是1963年发表的题为“孟德斯鸠与国富论”的文章(Devletoglou, 1963)。对于孟德斯鸠的经济思想,这篇文章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指出了法国学者对孟德斯鸠经济学思想的研究,列举了6篇将孟德斯鸠作为经济学家并对其思想进行研究的文献(全部是法文文献),还列举了1篇研究孟德斯鸠政治学思想的文献提到了其经济思想。二是开头就引用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法文版中的一段话,指称孟德斯鸠是法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孟德斯鸠就是法国的亚当·斯密。是你们的经济学家中最伟大的,在影响力、敏锐力和判断力上远超出重农学派。”<sup>①</sup>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凯恩斯赞扬孟德斯鸠的这段话只出现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法文版中,在其他版本中都没有。这篇文章的作者还提到,凯恩斯曾指出,其利率理论是“对孟德斯鸠学说的回归”。三是对孟德斯鸠经济学思想进行了评价,即“虽然孟德斯鸠从来没有自诩为经济学家,但是他创造性地关注了经济学的重要问题:经济福利的比较静态分析”。进而,作者指出,凯恩斯对孟德斯鸠的高度赞扬有些突兀,不能让人信服,试图寻找证据论证凯恩斯对孟德斯鸠的高度评价是有依据的。

对孟德斯鸠经济思想的研究,最新的文献是2016年出版的一部题为“孟德斯鸠的政治经济学”的专著(Bibby, 2016)。这部著作有四个方面的特点值得关注:(1)目标之一是研究孟德斯鸠的经济思想;(2)指出孟德斯鸠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特征,一是并未形成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二是所有的学者或思想家并不局限于像经济学、政治学或法学等某个学科,甚至到斯密时代还是如此;(3)指出了孟德斯鸠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在于强调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强调商业的政治重要性;(4)指出孟德斯鸠终生都在关注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包括公债、融资、商业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与孟德斯鸠时代法国的政治经济现实密切相关。

---

<sup>①</sup> 凯恩斯的这段评价应该是孟德斯鸠作为经济学家获得的最高评价,在研究孟德斯鸠思想的文献中被广泛引用,如Bibby(2016)等。很多学者对凯恩斯这段评价的真实性、目的等进行了研究,参见Bibby(2016: 158)中引言部分(“Introduction”)的注释54。

另外，还有几篇英文文献也提到了孟德斯鸠的政治经济学思想。Ferey (2012) 从孟德斯鸠关于团体间不平等和政治体制转型的论述说明了孟德斯鸠的思想对新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认为财富不平等分配会影响政治稳定和政治转型，即便是在共和政府中，不平等严重仍然可能会导致政治转型。另外，还有几篇文献关注到了孟德斯鸠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及出现的影响 (Tsuda, 1964; Ohno, 1964; Denis, 2011; Paola, 2007)。

### (三) 小结

通过前面的文献回顾和总结，可以得出：(1) 尽管对孟德斯鸠是否为经济学家存在争议，但是其经济学思想、政治经济学思想确实存在，并且具有一定影响；(2) 外文文献对孟德斯鸠政治经济学思想有一些挖掘，中文文献中基本上没有，只有极少数的文献提到过孟德斯鸠在商业方面的论述，但不是专门研究其商业思想。

基于此，本文的目标在于：基于现代经济学的视角对孟德斯鸠的思想进行挖掘和研究，并指出从中受到的一些启示，特别是他的许多思想可以转化成有待检验的假说或判断，也有一些思想能够启发对中国某些现实问题的解释或思考。

## 三、孟德斯鸠经济学思想及引发的思考

孟德斯鸠的经济学思想包括多个方面，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总结：一是货币的本质与利率决定的思想；二是宏观经济学思想；三是财政与税收的思想；四是国际贸易思想；五是其他方面的经济学思想，包括行为经济学、地理经济学和法经济学等方面。在引用孟德斯鸠的论述阐述其思想后，本文结合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对其思想进行阐释，以期对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有所启发。

### (一) 货币思想

在货币问题上，孟德斯鸠论述了货币的本质，阐述了货币数量对物价的影响，并提出利率是由货币供求决定的。

在货币的本质问题上，孟德斯鸠认为，“货币是代表着所有商品价值的标



志”（孟德斯鸠，2018：524）。一是货币是价值标志，它本身不是商品，而是代表商品价值的标志；二是货币是代表所有商品价值的标志，它能够与所有商品进行交易。这是因为从货币的起源看，货币本身是人类交易发展的结果，是为了方便交易、便于携带等。在货币形成之后，有金属货币，有不同材料的货币，如金或者银充当货币的材料，也有纸币。在不同金属都可以充当货币材料的时候，人们会随着不同货币材料价值的变化而囤积不同的金属，调节着市场上不同货币材料的价值。

孟德斯鸠区分了作为商品的金银和作为价值标志的金银，并且认为作为商品的金银是财富，其数量越多越好，但是如果金银是作为价值标志，其数量并非越多越好，因为货币数量的增加会引起物价水平的不断上涨，从而货币的价值将随着货币数量的不断增加而降低。他指出，“当人们把金银视作商品时，出现了大量的金和银自然就是好事。但是在人们将金银视作标记的时候，金和银数量大便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一旦数量增多，金和银作为标志的地位就会受到影响，而金和银只有在数量极少时才具备更高的地位”（孟德斯鸠，2018：528）。这是因为作为价值标志的金银实际上就是货币。在物品数量没有变化时，货币数量的增加，将意味着一定数量物品要用更多的货币来表示，反过来说就是一定数量的货币能够表示的物品数量减少，即一定数量的货币或者金银能够交换到的物品的数量减少。“金和银是一种虚拟财富或标志财富。这种标志很耐用，从性质而言不易损耗。金和银的数量越多，它们的价值就越低，它们能代表的东西就越少。”（孟德斯鸠，2018：510）孟德斯鸠还利用欧洲金属银大量增加的例子进行了说明。

孟德斯鸠的货币数量论是简单的货币数量论，只讨论货币的价值与货币数量的关系，即在商品数量一定的条件下，物价与货币数量成正比。他的这个观点与其货币本质的论述是一致的。之所以说孟德斯鸠的货币数量论是简单的，有两个原因。一是马克思认为孟德斯鸠等关于货币本质及货币与物价关系的论述掩盖了货币本身也是一种商品、本身也是劳动产品的观点，只是简单地将货币视为“一种单纯符号”（马克思、恩格斯，1972：109）。孟德斯鸠以此为基础将全部商品与全部货币相对应，然后提出全部商品中的一部分用全部货币中的一部分来表示，从而能够表示商品的货币符号越多，商品的价格就表现得越高，否则就越低。二是孟德斯鸠的货币数量论没有考虑货币数量增加所引起的商品价格上涨是“以什么方式、按什么比例提高价格的”

(布劳格, 2009: 10)。货币数量变化所引起的商品价格的结构性变化, 比认为货币数量变化引起商品价格同等数量的变化显然更有意义。

孟德斯鸠还详细讨论了货币利率、汇率的决定及其变化可能会对不同主体产生的有利或不利影响。在利率问题上, 他基于货币是价值标志的思想, 说明利息的本质是使用货币的租金。利息率既不能过高, 也不能过低, 否则就可能没有借贷了。货币供给和需求会影响利息率, 供给增加会降低利息率, 需求增加则会提高利息率。他指出, “为了使贸易能够良好地推进, 货币必须有价格, 但价格不能过高。如果货币价格过高, 那么商人会认为他要付的利息比从他经商中获取的收益还高, 那么商人就什么也不用经营了。如果货币没有价格, 也就没有人租用货币了, 而商人依旧什么生意也不用做” (孟德斯鸠, 2018: 550)。孟德斯鸠关于利率的分析受到凯恩斯的高度赞扬。凯恩斯认为, 其利率由货币供求决定的理论是对孟德斯鸠的“回归”(参见 Devletoglou, 1963)。但是, 凯恩斯无论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还是其他著作中都没有引用孟德斯鸠, 而只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法文版的“序言”(Preface)中表明, 利率理论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重要特色, 利率要保持货币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均衡, 即公众对流动性的需求和满足这种需求的手段供给之间的均衡,<sup>①</sup> 孟德斯鸠早在 18 世纪早期就非常清楚地发现了这个真理 (truth)。既然凯恩斯对孟德斯鸠如此推崇和赞扬, 那么为什么没有在其著作中引用孟德斯鸠呢? 据 Devletoglou (1963) 的研究, 凯恩斯是在完成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后才发现了孟德斯鸠对利率的阐述, 而不是在孟德斯鸠的基础上提出其利率理论的, 所以凯恩斯直到晚年在为法文版写序言的时候才提到孟德斯鸠。因此, 虽然凯恩斯认为他的利率理论是对孟德斯鸠的“回归”, 但是不能够说凯恩斯的利率理论源于孟德斯鸠, 也许说二者“异曲同工”更为恰当。这也反映出孟德斯鸠利率思想的前瞻性和深邃性。

在汇率问题上, 孟德斯鸠认为, 各国家之间的货币之所以存在汇率问题是因为各国家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是不同的, 汇率会随着各国家货币所代表价值的不同而变化, 而汇率变化对债权人和债务人、买者和卖者所产生的影响

① 凯恩斯对利率理论的详细阐述, 可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第 13 章“利息率的一般理论”(凯恩斯, 1999: 168—179)。

是不同的。

可见，孟德斯鸠对于货币的论述是比较全面的，涉及到了货币问题的各个方面，构成了其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

## （二）宏观经济学思想

孟德斯鸠始终关注国家的财富或福利问题，他特别论述了在收入不平等的条件下通过扩大高收入者或富人们的支出来维持经济运行的观点。

### 1. “如果富有的人不多花些钱，穷人们就会饿死”

“如果富有的人不多花些钱，穷人们就会饿死。”（孟德斯鸠，2018：137）孟德斯鸠的这句话初看起来是让人很不舒服的，好像穷人们要依靠富人多花钱才能够生活，富人多花钱是对穷人的仁慈和怜悯，这也成为孟德斯鸠受到许多追求社会公平、关心社会疾苦者批评的重要依据之一。然而，仔细思考孟德斯鸠的这句话，结合上下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个思想与凯恩斯（1999）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高有支付能力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扩大有效需求”的论述基本上是一致的。从上下文的内容来看，孟德斯鸠的这句话是在讨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等导致奢侈消费的时候提出来的，其目的倒不在于说明奢侈消费是合理的，也不在于说明财富分配不均等是合理的，而在于说明在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等作为一个外生前提下，富人提高消费支出才能够使社会正常运转，才能够增加穷人们的收入水平。

在一个收入或财富分配不公平的社会中，穷人们可能存在各种需求，但形不成有效需求，原因是没有支付能力。而富人们在满足基本需求时，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很低，结果就可能是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危机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扩大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才能避免危机的发生。除了增加政府公共支出，扩大有效需求外，提高富人们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也是重要的举措，也就是要让富人们多花钱、多消费、多投资。只有这样，穷人们才能够源源不断地赚取收入（当然，也可以推翻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制度，剥夺富人们的财富）。所以，孟德斯鸠的这句话虽然乍看让人不舒服，但是考虑到其分析的前提，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视角进行分析也就可以理解了。

实际上，孟德斯鸠的这个思想并非他的原创，而是17、18世纪包括重商主义在内的流行看法。正如布劳格所指出的，“当17世纪、18世纪的作者崇

尚富人的奢侈品消费时，他们的理念是富裕阶层的‘高水平生活’产生欲望并在各方面刺激金钱上的动机”（布劳格，2009：6），“在奢侈品上平衡地主支出是维持流通从而实现繁荣的要素”（布劳格，2009：17）。布劳格还通过引用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种“18世纪的正统思想”：“不对穷人做善事，你就不可能享受奢侈品。而且，你消费奢侈品要比施舍更好，因为，通过奢侈品的消费，你使他们勤劳工作，而通过施舍只会让他们懒惰。”（布劳格，2009：6）布劳格认为，这种崇尚奢侈品消费、多消费的观点影响了凯恩斯，对其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的提出有启发意义。

## 2. 收入分配差距与奢侈品消费

孟德斯鸠指出，“奢侈存在的唯一基础就是一个人能方便而舒适地剥夺他人的劳动成果”（孟德斯鸠，2018：133）。孟德斯鸠是在讨论奢侈与财富的关系时提出这个判断的。他认为，奢侈和财富分配不均呈正相关关系，如果一个国家平均分配财富的话，就不存在奢侈。由于财富分配不均，有些人能够比其他人相对容易地获得财富或者是通过剥夺其他人的劳动成果而获得财富，或者说，由于他们获得财富与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在与别人获得相同财富的时候付出的劳动少或者付出相同的劳动能够得到更多的财富，那么其对获得或拥有财富的珍视程度就会比较低，从而就越有可能奢侈生活或消费更多的奢侈品。

孟德斯鸠主要从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来论述奢侈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思想还可以进一步延伸至腐败、寻租与奢侈消费的关系。从最直接的机制来看，一个社会的腐败越严重，用作腐败“礼品”的奢侈品需求就越多，即腐败越严重，奢侈消费越多。从孟德斯鸠关于奢侈基础的思想出发，还可以得出一种间接机制。因为腐败、寻租等都意味着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剥夺。腐败是利用公权力来谋取私利，即利用了他人的资源为自己谋取私利，比利用自己拥有的生产要素获利要容易；寻租虽然未必是利用公权力，但也是利用他人的资源为自己获利，而且在相同的投入下能够获取更高的收益。既然通过腐败或寻租能够相对比较容易地获得收入或财富，那么这种财富获得的边际成本就比较低，其在消费时按照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边际收益较低时也会被支出；或者说，其为奢侈品消费所支出财富的边际成本比较低甚至为零，这自然就会推动奢侈品的消费。

根据孟德斯鸠的思想，可以得出几个假说：（1）一个社会的收入或财富

分配越不平等，奢侈品消费越多，从而奢侈品的销售量就越多、价值越高；  
(2) 腐败或寻租的程度会影响奢侈消费，一个社会的腐败越严重、寻租越严重，奢侈品消费就越多，奢侈品销售量也越多、价值越高。

### 3. “品位是一个国家财富的源泉”

“品位是一个国家财富的源泉。”（孟德斯鸠，2018：416）孟德斯鸠是在讨论一个民族人们的谈吐、心灵、生活和思想等时提到“生活的乐趣、品位”，提到法律可以修正人们的行为，比如限制妇女的奢侈。问题是，限制妇女的奢侈可能会使女性失去一定的品位。然后，他就写下了“品位是一个国家财富的源泉”这句话。从上下文来看，限制妇女的奢侈会让她们失去一定的品位，而既然品位是一个国家财富的源泉，那么法律就不应该做这种修正。所以，孟德斯鸠将“品位是一个国家财富的源泉”看作一般的理论并用于分析。既然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学问，那么如何来看待“品位是一个国家财富的源泉”这个理论判断呢？

品位泛指人或事物的品质，与档次、层次、格调等相关。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品位，决定或反映了其消费水平和层次。在收入水平既定的前提下，品位越高，消费水平越高，即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越高，而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无论是在食物、衣着还是其他消费品上，品位的提升会成为推动增长的重要力量。比如就餐，在食物上更加精致、在环境上更加优雅、在衣着上更加正式，品位的提升意味着更高的消费或支出，也意味着需要更加精致的工艺。所以，品位提升意味着消费水平的提升，既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增长，也能够通过高品位产品的精细化等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人们对高品位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会成为人们工作或劳动的动力，也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正如孟德斯鸠所认为的，对品位的追求所产生的虚荣会成为其勤劳、比别人更努力、比别人工作更好的动力（孟德斯鸠，2018：418）。孟德斯鸠对“品位”的分析，不能够不让人想到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sup>①</sup>对有闲阶级“明显消费”或“炫耀性消费”的分析。有闲阶级在饮食方面“越来越认真”，在高档食物、饮品、饰物等方面成为“行家”（凡勃伦，1964：57），是“品位”的体现，是为了显示其“地位”和财富，进而个人对财富的追求和竞争可能也会促进一个国家财富的增

<sup>①</sup> 亦有将其姓氏译为凡勃伦。

长。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凡勃仑参考了孟德斯鸠或者受到了孟德斯鸠的影响，但是至少可以认为孟德斯鸠早在凡勃仑之前 150 多年就意识到了“品位”与财富之间的关系。

反过来，品位的形成虽然与多种因素有关，但是最重要的，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等密切相关。固然在相同的收入下，个人之间的品位会存在差别，甚至差别很大。但是，无可否认，个人的品位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升；一个国家的品位也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升。因为品位是建立在支付能力基础上的，只有在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支付能力也相应提升的条件下，品位才会不断提升。比如，在中国从温饱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转变，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之后，无论是在食物、衣着等有形物品方面，还是在教育、医疗等服务方面，需求的层次都在不断提高。

虽然“品位是一个国家财富的源泉”，但是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能够为追求品位而追求品位，或者追求超出个人收入及消费水平的品位。就个人来说，如果所追求的品位过高而超出自身的收入水平或支出能力，那么就可能无法支撑下去；就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所追求的品位超过所处的发展阶段或水平，那么就可能使得消费率过高、储蓄率过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或发展。所以，品位要与一个人的收入水平或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相适应。

### （三）财政与税收的思想

孟德斯鸠论述了财政的本质，具有公共财政思想，强调了适度税收的重要性，讨论了税收应该以最低成本征收的方式等。

孟德斯鸠论述了财政的交易本质。他认为，国家的财政收入来自公民的个人财产，是公民财产的一部分；公民纳税是为了国家提供安全等公共产品。“国家财政收入是国家每位公民上缴的个人财产的一部分，公民以此换取另一部分财产的安全，或是为了快乐地享用这部分财产。”（孟德斯鸠，2018：293）这体现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交易关系。从公民的角度，公民的个人财产分为上缴给国家的税和个人支配的财产两大部分，交税之后换取安全等公共产品才能够更好地保护个人的其他财产或更好地享用或使用其他财产；从国家的角度，国家的财政收入来自公民，收税就要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孟德斯鸠的这个论述阐明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交易关系，是公共财政思想的核心。

以此为基础，孟德斯鸠认为，国家在确定财政收入时要统筹考虑国家的需要和公民的需要，不能为了国家的需要而攫取人民；国家的财政收入应以公民应该缴纳多少财产来衡量，而公民应该缴纳多少财产、保留多少财产不是随意确定的，而是需要国家谨慎确定的。国家不能征收过重的税收，否则就可能导致国家的贫穷。因为过重的税收可能会导致公民“用脚投票”或懒惰。“用脚投票”意味着公民将离开税收过重的国家而到其他国家，公民离开则意味着失去创造价值或财富的人口；“懒惰”意味着公民在闲暇和劳动之间选择闲暇，税收过重以至于劳动能够为自己带来的财富不足以弥补劳动的负效用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劳动。

孟德斯鸠论述了税收征收方式的问题。首先，他根据“税收转嫁”和“税收幻觉”的思想提出在商品销售时征税比征收所得税、人头税等要“隐蔽”，从而更容易被商品的销售者和购买者所接受，因为销售者会将税收转嫁给购买者，而购买者支付的价格并没有明确标出所支付的税收部分，从而双方都没有感觉到税收。其次，他比较了包税制和直接征税制的福利影响，认为相对于包税制，直接征税既“省钱又有序”（孟德斯鸠，2018：307—308），因为直接征税减少了征税的环节，不会让包税人从中牟利，不会让人民因为包税人的暴富而伤心。

另外，孟德斯鸠还论述了通过国家补贴和税收惩罚等鼓励人口生育的思想。他首先论述了人类的生育决策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对人类而言，思维方式、性格、热情、幻想、任性骄纵、保持容颜的想法、生育的痛苦、家里人口太多带来的不便等因素，能够以一千种方式影响繁殖”（孟德斯鸠，2018：562）。个人的生育决策会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而个人的生育决策又受到该国家或地区政策或制度的影响。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增长缓慢或者由于瘟疫、战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出现人口数量过少的时候，对生育、多生育进行补贴或者对不结婚、不生育、晚生育进行惩罚，可能是鼓励生育的最直接措施。在历史上，很多国家或地区曾经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或制度，典型的就是对多生育者进行奖励，对不婚不育者进行惩罚。这类政策措施至少从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开始，孟德斯鸠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1）对不结婚者进行羞辱和惩罚，“在法律之外，监察官还要对婚姻进行监督，……通过羞辱和惩罚来使人们结婚”（孟德斯鸠，2018：576）。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和奥古斯都（Gaius Octavius Augustus）都设立了多种规

章制度来奖励已婚已育者、惩罚未婚未育者。比如，凯撒“禁止四十五岁以下未婚未育的女子佩戴珍贵的宝石或乘轿出门”（孟德斯鸠，2018：577）。（2）给予已婚已育者荣耀、奖赏和特权。孟德斯鸠提到了三种特权：第一种是给予已婚人士的特权，和是否生育无关，称为“夫权”；第二种是给予有子女者的特权；第三种是给予有三个及以上子女者的特权。这些特权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在生活中、在工作中都有所体现，“已婚者如果拥有最多的子女总是会受到最优待，无论是在追求荣光方面还是在享受荣光方面”（孟德斯鸠，2018：579）。比如，在剧院，已婚已育者可以坐特殊的座位；“子女数最多的监察官可最先接受束棒，可以优先选择领地；子女最多的元老院成员名列元老院的最前列，在元老院最先发言”（孟德斯鸠，2018：579）。（3）对未婚者进行惩罚，特别是在遗产继承方面。比如未婚者不能够从亲属那里继承遗产；夫妻双方如果生有子女的话可以将一半的遗产留给对方，如果没有子女，根据婚姻关系只能继承十分之一的遗产。可以看出，至少从古罗马时期，立法者就在利用奖惩措施改变人们的婚育决策。

孟德斯鸠对于财政和税收的思想既揭示了财政和税收的交易本质，又阐明了一个国家税收过重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以及不同税收方式对消费者、生产者等的福利影响，对现代国家财政和税收的认识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 （四）国际贸易思想

孟德斯鸠的国际贸易思想，主要是论述贸易导致的制度改进和制度趋同，以及“贸易和平论”。

孟德斯鸠指出，“哪里有温和善良的风俗，哪里就有贸易；哪里有贸易，哪里就有温和善良的风俗”（孟德斯鸠，2018：448）。孟德斯鸠的这句话出现在他讨论“贸易”那部分内容的开头，实际上说明了制度与贸易间的关系，因为风俗也是制度的一种。这句话包括两个假说或判断：一是良好的制度能够提高贸易量；二是贸易能够改善一个国家的制度，进而贸易能够使参与国家的制度向优良的制度趋同。

就第一个判断来说，国家间的贸易虽然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解释，但确定不变的是贸易参与国要能够从贸易中获益，而且参与贸易的双方都能够从中获益。良好的制度，无论是正式的法律制度还是非正式的风俗习惯，都能够降低贸易双方的交易成本。重要的是，一个制度良好的国家能够吸引他国



与该国进行贸易，这些制度包括公平贸易的精神、安全的财产权利、稳定足值的货币制度等。既然如此，那么一个国家的制度改善或制度质量提高也能够提高该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量，当然这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或者说，如果能够控制住其他影响国际贸易量的因素，那么一个国家的贸易量应该与该国的制度质量呈正相关关系。如果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制度改善可能对贸易的影响，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对方国家制度质量提高会使本国与对方国家的贸易量增加，或者说，本国与对方国家的贸易量与对方国家的制度质量成正相关关系。

就第二个判断来说，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参与国际贸易而不断改进本国的制度，并最终与制度优良国家趋同。这至少存在两种机制。一种机制是为参与贸易而不断改进本国的制度，并与制度优良国家趋同。另一种机制是通过学习效应和制度比较而改进本国制度，即因为参与国际贸易而不断了解到他国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与本国已有的制度进行比较。如果他国的制度比本国制度更好（比如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有更高的经济绩效等），那么就学习和借鉴，从而不断改进本国的制度，使制度质量不断提高。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贸易使所有国家的风俗知识传遍世界。各国的风俗都在相互比较，因此在这比较中，也产生了一些好的结果”（孟德斯鸠，2018：448）。这个判断也可以表述为待检验的假说：（1）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会随着贸易的发展而不断提高；（2）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与贸易量呈正相关关系；（3）一个国家制度质量的提高与贸易量呈正相关关系；（4）两个国家间的制度差异会随着贸易的发展而缩小；（5）两个国家间的制度差异与贸易量呈负相关关系；（6）两个国家间的制度差异与贸易量的增加额呈负相关关系；（7）全球贸易的扩大有助于低质量制度的国家提高制度质量，缩小国家间的制度差距。

对于贸易的影响，孟德斯鸠还提出了“贸易和平论”。他认为，“贸易带来的自然结果是和平”（孟德斯鸠，2018：449）。这是因为，相互通商的两个国家之间会对彼此有依赖。这种相互依赖的程度越高，意味着一旦发生冲突或战争，两个国家遭受的损失就越严重。因而，贸易会降低两个国家之间冲突的可能性，能够使贸易双方尽可能克制，不发生冲突或战争。这个判断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假说。但是，决定国家间和平或战争的因素非常多，并非所有相互贸易的国家间都一定没有冲突或战争，都一定是和平的。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国家间的贸易、贸易量的增加

或者贸易依存度的提高，能够降低国家间冲突发生的概率；二是国家间贸易量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或者贸易依存度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够避免战争或冲突的发生，原因是参与贸易国家间的决策是权衡利益的大小；三是第三国的影响，虽然两个国家间存在很高的贸易量，但是如果这种贸易并非专有依赖，而是很容易转到与他国的贸易，那么这种贸易依赖将是脆弱的，就很难起到促进“和平”的作用。孟德斯鸠的这个假说体现出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另外，孟德斯鸠还从贸易对人们行为影响的角度论述“贸易和平论”的判断，即“贸易的精神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了精准的公平感”，“如果没有贸易精神，就会产生强盗行为”（孟德斯鸠，2018：449）。贸易的本质是平等主体间的交易，是能够使双方都可以从中受益的交易，所以贸易的发展有助于让人们感受到平等交易给双方带来的收益，从而培养起通过公平交换而不是野蛮抢夺获取对方物品的信念。

#### （五）其他方面的经济思想：行为经济学、地理经济学和法经济学

孟德斯鸠的经济学思想中还包含着行为经济学、地理决定论和法经济学的思想。行为经济学主要强调了音乐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进而可能会对经济产生影响；地理决定论强调地理因素对一个国家经济活动和兴衰的影响；法经济学则强调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人们的福利。

##### 1. 音乐、行为与经济

音乐、行为和经济三者看起来似乎毫不相关，但是如果考虑到音乐可能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而经济活动只不过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就很容易看出三者之间的关系。孟德斯鸠认为，音乐会对个人或民族的性格或习俗产生影响。他写道，“音乐对于缓和阿卡狄亚人的习俗是非常有必要的，他们生活的国度气候阴暗而寒冷。西内特人的居民忽视了音乐的熏陶，他们的凶狠残暴超过了所有其他地区的希腊人，他们居住的城镇犯罪案件数不胜数”（孟德斯鸠，2018：54）。这段话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受到音乐的熏陶后可能会改变习俗。音乐改变一个社会习俗的机制在于，“音乐经由身体感官进入人的心灵”（孟德斯鸠，2018：55），从而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也即改变人们的认知、思想等，最终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风俗，“软化民风”（孟德斯鸠，2018：55）。由于音乐的熏陶能够控制人的残暴和野蛮，而让人变得柔和、怜悯，所以音乐也能够抑制犯罪，降低犯罪率。孟德斯鸠也并非认为所

有的音乐都是一样的，柔和优美的乐曲能够敦化民风习俗，而慷慨激昂的乐曲却能够起到擂鼓吹号的作用，所以为了不同的目的而选择不同的乐曲是重要的。

对于音乐与行为的关系，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也有类似表述：“当音乐模仿出悲伤或快乐的调子时，它或者在我们身上现实地激发这些激情，或者至少使得我们处在乐于想象这些激情的心情之中。但是，当音乐模仿出愤怒的音调时，却使我们产生恐惧。快乐、悲伤、热爱、钦佩、忠诚等都是天然地具有音乐性的激情。”（斯密，1997：42—43）

孟德斯鸠关于音乐和行为关系的思想，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延伸到音乐与经济间的关系。一是音乐对人的经济行为或活动的影响。一个人是否听音乐、听什么样的音乐，可能会影响其消费、生产或投资行为等。如果个人行为的加总形成社会行为的话，那么一个社会的音乐普及程度和乐曲选择也会影响总体的经济行为和结果。二是音乐经济。其可以被定义为以音乐为标的或对象的经济活动，基本上可以指音乐产业及与此高度相关的产业，涉及音乐的生产、消费、交换或分配等活动。将音乐视为一种产品，其生产除受到爱好、天赋等的影响外，各种激励或约束机制也会影响其生产，比如音乐知识产权的保护，既包括曲、词的知识产权，也包括曲、词传播的知识产权。作为作品，曲、词的知识产权会影响到创作者的积极性；而曲、词演奏的声音、图像等传播的知识产权保护也会影响到演奏者、歌唱者及制作人等的积极性。积极性的关键在于音乐作品能否为相应的主体带来收益以及带来多高的收益等。音乐产品也许具有特殊性，即生产上具有私人产品性质，而在传播中却具有部分公共产品的性质。在网络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音乐的传播基本上为零边际成本的，这更突出了音乐知识产权保护的特殊性。另外，像演唱会、音乐会等是典型的音乐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消费者购买音乐服务，歌手、乐队、演艺公司等提供音乐服务。所有的演艺活动实际上都可视为经济活动。三是经济发展水平对音乐消费、生产等的影响。从个体的角度，一个人的收入会影响其对音乐的需求，包括需求的多少、需求的种类等；从社会的角度，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或收入分配等因素都会对音乐的需求和消费、生产等产生影响。当然，无论一个人、一个社会具有什么样的收入水平、处于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水平，都会有对音乐的需求，因为音乐几乎是人类最早的语言活动。但是，不同的发展阶段所生产或消费的音

乐是存在差别的。

在音乐与经济关系的这三个方面中，最直观的是音乐经济，即音乐产业的发展，因为音乐产业已经发展出了从生产者（音乐人）到消费者的多层级的完整产业链。然而，音乐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方面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比如，Edmans et al. (2022) 研究了音乐情绪和股市回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音乐情绪与股市同期收益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证实了音乐对经济行为进而对经济结果的影响。

根据孟德斯鸠的思想及其延伸出的音乐经济的三个方面，可以得出一些假说或判断：（1）音乐的普及程度会影响一个社会的风俗和民风，且普及程度越高，民风越善良、越敦厚；（2）音乐的普及程度越高，一个地区的犯罪率越低；（3）不同类型音乐的普及所产生的影响在效果上存在差别；（4）音乐的普及程度会对人们的消费和投资产生影响；（5）如果音乐的普及程度可以采用音乐产业的发展来衡量的话，那么一个社会的音乐产业发展水平越高、人均音乐支出水平越高，则犯罪率越低；（6）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音乐消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音乐消费越多，或者，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则人均音乐消费支出越高。如果考虑到不同类型的音乐可能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还可以对一个社会音乐类型结构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提出更多的假说和判断。当然，这里只是列出这些假说，它们的真伪还需要进行验证。

## 2. 地理决定论

孟德斯鸠被认为是从地理、纬度、气候解释国家贫富的提出者（阿西莫格鲁、罗宾逊，2015：34）。他是从气候对人的生理特征的影响开始分析的。气候会对人体皮肤、心脏和身高等产生影响，而这会对人们的性格和行动产生影响。在寒冷的气候下，人们的精力更为充沛、心脏更有力量，更为自信，更有勇气，更有安全感；而在炎热的气候下，人们会感到痛苦、心神萎靡。因此，寒冷地区的人们会更加勇往直前。由于气候不同，人们的神经系统和感觉灵敏程度也是不同的。炎热地区的人们感觉灵敏，寒冷地区的人们感觉不算很灵敏。所以，寒冷地区的人们对疼痛、对爱情等的感觉都比炎热地区的人们要弱。孟德斯鸠得出结论，“气候过于炎热的时候会使当地的人们完全失去力气。因此，这种虚脱萎靡的状态也会蔓延到精神；没有好奇、没有高尚的进取心、也没有慷慨豁达的感情；一切的爱好的都将是被动的；懒惰或将成为幸福”（孟德斯鸠，2018：319）。基于孟德斯鸠的这个判断，经济学家们

延伸出，由于气候炎热国家的人们精神萎靡、创新力和进取心不足、懒惰，所以这些国家自然也就相对比较贫穷。

这种判断得到了许多经验的支持，但是也存在许多反论。因为当前世界上各国家间的贫富差距仍然很大，而且贫富国家的地理分布特征还比较明显。一个表现是富裕的发达国家大多数在北方，而贫困落后的国家通常在南方，比如北美洲和南美洲、北美洲的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亚欧非大陆的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就全球经济的发展程度来说，大多数富裕的发达国家位于四季分明的温带，而大多数贫困落后的国家位于赤道周围。另一个表现是沿海国家和内陆国家、一个国家内部的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距。然而，并非所有的南方国家或者炎热地区国家都贫困，也并非所有温带国家都富裕；并非所有的沿海国家或地区都富裕，也并非所有的内陆国家或内陆地区都贫困。这又说明，“地理决定论”并不总是成立的。

“地理决定论”还可以扩展到“自然资源说”，即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发达富裕是由于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在发展的初期具有显著的优势，对自然资源本身的开发、利用就是财富的源泉。然而，这些国家或地区在自然资源被开发利用完、资源枯竭之后又可能陷入困境，即所谓的“资源诅咒”。而资源贫乏的国家，由于没有可直接开发利用的资源，只好发展其他制造业等，却可能创造出发展的优势。比如，日本就是一个公认的自然资源不丰富的国家，然而日本却是亚洲最早实现工业化、达到发达阶段的国家。

地理、气候通常被视为影响经济活动的外生因素，因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理位置或气候在短时间内不会变化。有些学者以此来解释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后而陷入悲观“宿命论”。其实不然，因为虽然地理或气候因素不能变化，但是孟德斯鸠认为，通过法律制度等可以改变对人们的激励或约束、改变人们的行为，尽可能发挥人们的积极性。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我无法断定十九世纪后半期社会学文献中颇为频繁地出现的环境决定论……在多大程度上应归结为孟德斯鸠的影响”（熊彼特，1992：86）。

由此可以想到中国的财富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长时期观察，中国历史上曾经最富庶的地区已经辉煌不再，而曾经的蛮夷之地却成为最富庶的地区；短时期观察，新中国成立之后，财富分布南、北“逆转”。这种财富地理分布的变化显然是不能够用“地理决定论”来解释的，但是作为外生因素的地理

却无疑构成了发展的初始条件，直接决定着发展的路径，这又不能不说“地理”还是起作用的。正如戴蒙德（2017）在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时一样，他虽然先提出了地理和制度两个视角，然而在分析制度为什么会存在差异时又回到了地理决定论。

### 3. “人民的幸福安康是至高无上的法律”

“人民的幸福安康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孟德斯鸠，2018：671）虽然孟德斯鸠是在讨论王位继承顺序问题时提出这个原则的，但是它应该适用于所有的政体，这应该也是孟德斯鸠所论述的“法的精神”的核心。这是因为他对国家本质的论述是从个体出发的。“由于人类放弃了自然赋予的独立生活权力，而选择生活在政治法律之下，那么人类也就放弃了自然给予他们的财产共有权，而选择生活在民法的约束之下。”（孟德斯鸠，2018：663）既然国家在本质上是人们放弃一部分自由、财产的结果，那么人们所享受的自由和财产应该不能比放弃前少，否则人们就不会放弃一部分自由或财产而在法律的约束之下。

孟德斯鸠的这个思想现在仍然成立，并且具有重要的意义，应该成为所有国家立法者遵守的基本原则。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民的幸福安康需要以个人和国家两个层面的财富为基础。个人必须拥有一定量的能够支配、使用的财富；国家必须拥有能够为人们提供幸福安康的条件，包括给人们提供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从这个意义上看，一个国家制定的法律制度要有助于“国富民强”，如有效保护个人财产权的法律制度、适度税收和提供公共产品的法律制度，并且要建立起保证各种法律制度有效实施的法律机制等。

“人民的幸福安康”是孟德斯鸠“法律精神”的本质，也是其全部经济学思想的落脚点，体现出现代法经济学思想的核心，即法律与经济的关系，当然这也是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 四、结束语：孟德斯鸠的经济思想为什么没有得到重视？

孟德斯鸠是否为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争论的意义不大，也没有必要争论，因为孟德斯鸠所处的时代，经济学与法学、政治学，甚至与伦理学、哲学等都没有完全分开，也就不存在所谓宣称的经济学家。在孟德斯鸠之后，以魁奈为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才成为自称“经济学家”的小团体。但是，作

为极力关注法国政治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讨论了包括法国经济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经济问题，包含了多个方面的经济思想，行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金融学、国际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的一些思想在孟德斯鸠的著作中都有涉及，然而对孟德斯鸠经济学思想的研究却不多。

究其原因，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推测。一是孟德斯鸠的法学和政治学思想过于突出，有些国家的政治家们采用了他这两方面的思想，从而掩盖了人们对其经济学思想的关注。二是孟德斯鸠虽然阐述了许多经济学思想，但是有些经济思想很快就被超越了，正如彼得·格罗奈维根（Peter Groenewegen）所指出的，“孟德斯鸠的洞见并非没有原创性，但是都很粗糙，不免要被超越”（参见 Bibby, 2016: 6）。而且事实上，在孟德斯鸠逝世后不久，这些思想就被超越了。比如，孟德斯鸠阐述的货币数量论基本上是简单的货币数量论，即认为货币数量与价格成正比。然而就在孟德斯鸠逝世的同一年（1755年）出版的康替龙的《商业性质概论》就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康替龙效应”的深入分析，即有关“货币的增加，是以什么方式、按什么比例提高价格的”分析（布劳格，2009：10；埃克伦德和赫伯特，2017：68），这显然比孟德斯鸠的论述要深入得多。三是受法国与英国经济实力和经济地位的对比，及法国经济学的地位的影响。正如林毅夫所指出的，“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也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成就”（林毅夫，1995）。所以，从18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在孟德斯鸠所处的时代，即“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期，当时意大利已经旧日风光不再，荷兰的服装产量稳步萎缩，法国则正经历着长期衰退的痛苦；而当时英国的羊毛消费量却以每10年8%左右的速度增长，而且大约从1740年至1770年，10年增长率达到13%或者14%”（兰迪斯，2002：263）。孟德斯鸠所处的时代，法国经济正处于衰退期，英国经济正处于上升期，法国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孟德斯鸠的经济思想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中，前两个原因比第三个原因更有说服力。第一，孟德斯鸠所处时代的法国虽然经济已经长期衰退，但是经济实力仍然是欧洲最为强大的。根据麦迪森（2003：259、262）估算，按照GDP来衡量，从

1500年到1820年，法国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一直到1830年英国的经济总量才超过法国；然而按照人均GDP来衡量，法国从1600年之后就一直低于英国。第二，在孟德斯鸠之前和之后，都有许多法国经济学家或思想家的经济思想被研究和关注，比如孟德斯鸠之前的孟克列钦，差不多同时期的康替龙，之后的魁奈、杜尔哥、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等，虽然他们的名声和影响不如英国的斯密、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但是却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康替龙的《商业性质概论》被认为“代表了亚当·斯密以前经济学的最高水平”，是“政治经济学的摇篮”（埃克伦德、赫伯特，2017：64、65）；魁奈的《经济表》被认为是“这一时期经济理论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贝劳德、斯坦纳，2016：438）。在前两个原因中，孟德斯鸠思想中的法学和政治学思想的原创性比经济学思想的原创性更强，而且其经济学思想主要是服务于法学和政治学思想的，当时政治经济学还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或课程。实际上，直到1795年，政治经济学才首次成为学院的正式课程。“在大革命期间，所有权、税收和公民之间的这种关系发挥了一种实质性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政治经济学具有与伦理学、政治科学和法学同样的地位。正是以这种形式，像伦理学和政治学一样，政治经济学首次成为学院的正式课程（1795年）。”（贝劳德、斯坦纳，2016：439）所以，从研究对象的层次来看，在孟德斯鸠时代，法学和政治学是比政治经济学更高层次的研究对象和问题，其法学思想和政治学思想受到关注，而经济学思想不被关注，也就可以理解了。

#### 参考文献：

- 阿西莫格鲁，德隆、詹姆斯·A. 罗宾逊，2015，《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埃克伦德，小罗伯特·B.、罗伯特·F. 赫伯特，2017，《经济理论和方法史》，杨玉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巴克豪斯，罗杰·E.，2007，《西方经济学史》，莫竹芬、袁野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
- 贝劳德，艾伦、菲利普·斯坦纳，2016，《法国经济学（1870年以前）》，宁旭译，载史蒂



- 文·N. 杜尔劳夫、劳伦斯·E. 布卢姆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
- 布劳格, 马克, 2009, 《经济理论的回顾》, 姚开建译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戴蒙德, 贾雷德, 2017, 《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 有的国家贫穷》, 栾奇译, 中信出版社。
- 凡勃伦, 1964, 《有闲阶级论》, 蔡受百译, 商务印书馆。
- 冯明亮, 2015, 《从孟德斯鸠看商业对古典共和主义的冲击》,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 古海, 1988, 《孟德斯鸠论商贸》, 《广东商学院学报》第2期。
- 凯恩斯, 约翰·梅纳德, 1999,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高鸿业译, 商务印书馆。
- 坎南编著, 1962, 《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 陈福生、陈振骅译, 商务印书馆。
- 兰德雷斯, 哈里、大卫·C. 柯南德尔, 2014, 《经济思想史》, 周文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 兰迪斯, 戴维, 2002, 《1750—1914年间西欧的技术变迁与工业发展》, 载H. J. 哈巴库克、M. M. 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工业革命及其以后的经济发展: 收入、人口及技术变迁》, 王春法、张伟、赵海波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 林毅夫, 1995, 《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 《经济研究》第10期。
- 罗宾斯, 莱昂内尔, 2008, 《经济思想史: 伦敦经济学院讲演录》, 杨玉生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19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 麦迪森, 安格斯, 2013, 《世界经济千年史》, 伍晓鹰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孟德斯鸠, 2018, 《论法的精神》(上、下), 祝晓辉、刘宇飞、卢晓菲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 荣卡格利亚, 阿列桑德洛, 2009, 《西方经济思想史》, 罗汉等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萨维尔, 斯蒂文, 2009, 《法律的经济分析》, 柯华庆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沙维尔, 斯蒂文, 2013, 《法律经济分析的基础理论》, 赵海怡、史册、宁静波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斯密, 亚当, 1997, 《道德情操论》, 蒋自强等译, 商务印书馆。

- 斯密, 亚当, 2017, 《法理学讲义》, 冯玉军、郑海平、林少伟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熊彼特, 约瑟夫, 1991, 《经济分析史》第1卷, 朱泱等译, 商务印书馆。
- 熊彼特, 约瑟夫, 1992, 《经济分析史》第2卷, 杨敬年译, 商务印书馆。
- 余艳红, 2012, 《孟德斯鸠论商业精神、商业与共和政体》,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张弛, 2020, 《孟德斯鸠论商业精神与征服精神》, 《世界历史》第3期。
- 张弛, 2021, 《孟德斯鸠商业思想语境辨析》, 《史学月刊》第8期。
- Bibby, Andrew Scott. 2016. *Montesquieu'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Crane, R. S. 1941. "Montesquieu and British Though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9 (4): 592 - 600.
- Denis, de Casabianca. 2011. "Politics, Economics and Law in Montesquieu's Spirit of Laws."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136 (4): 592 - 593.
- Devletoglou, Nicos E. 1963. "Montesquieu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9 (1): 1 - 25.
- Edmans, Alex, Adrian Fernandez-Perez, Alexandre Garel, and Ivan Indriawan. 2022. "Music Sentiment and Stock Returns around the World."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45 (2): 234 - 254.
- Ferey, Samuel. 2012. "Montesquieu et la Nouvelle Économie Politique. Inégalités et Instabilité Politique." *Revue Économique* 63 (3): 623 - 633.
- Ohno, Seizaburo. 1964. "Montesquieu and the Classical School of Political Economy." *Economic Review* 15 (3): 240 - 249.
- Paola, Salerni. 2007. "Montesquieu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Studi Francesi* 51 (3): 660 - 661.
- Polinsky, A. Mitchell, and Steven Shavell (eds.). 2007. *Handbook of Law and Economics*. Oxford: North-Holland.
- Tsuda, Takumi. 1964. "Montesquieu and the Classical School of Political Economy." *Economic Review* 15 (3): 229 - 239.

## Montesquieu's Economic Thought and Its Modern Interpretation

*Li Zengang*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Although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thinker Montesquieu is mainly concerned with his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s to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his works contain rich economic thought. His economic ideas are elaborated to discuss the issues in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volving many aspects of economics, such as macroeconomics, finance, public finance,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tc., and many ideas still serve as an important inspir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economic issues. Studying Montesquieu's economic thought and interpreting it according to modern economics help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economic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and to enrich and perfect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Keywords:** Montesquieu, Political Economy, Economic Thought

**JEL Classification:** B11, B31, E21

(责任编辑: 王姣娜)